

职业稳定性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影响

——以骑手为例

田 丰 王 璐

【摘 要】 职业是实现个人发展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新业态下骑手职业群体的发展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案例访谈的基础上运用全国新职业青年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对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进行比较研究，并使用回归模型分析职业稳定性对骑手美好生活向往的影响。研究发现：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在职业收入与保障、择业动机、职业流动情况、职业认同度、城市归属感等方面存在差异；同时，职业稳定性对骑手生活预期和职业发展预期均存在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就骑手的职业稳定性进行讨论。

【关键词】 骑手 职业稳定性 生活预期 职业发展预期

【作者简介】 田丰，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 2021 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2) 11 - 0071 - 19

一、研究背景

互联网科技进步和外卖行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青年就业结构的变化，也催生出一种被俗称为“骑手”的全新职业——网约配送员。网约配送作为“互联网+服务业”和“智能+物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不仅符合新兴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让普通民众生活更加便利，顺应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近年来，骑手职业群体规模不断增大。以美团外卖骑手为例，2018 年注册骑手数为 270 万人，比 2017 年增加近 50

万人;^① 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23.3%;^② 2020年上半年,美团骑手总数达295.2万人,同比增长16.4%。^③ 2020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网约配送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提到,预计未来5年网约配送员的需求量约为3000万人。^④

作为一种新型职业,骑手凭借入门门槛低、工作时间灵活、工作环境自由、收入较高等优势吸引了大量来自农村地区的青年劳动者,但他们与互联网平台之间形成的较为特殊的就业—雇佣关系,在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和社会保障方面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骑手职业稳定性较差的负面新闻屡屡发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就业稳定性不仅会影响劳动者自身的职业发展信心以及对未来的生活预期,而且会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因而,探究骑手职业稳定性及其影响,既具有推进学术研究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关注社会问题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由于骑手作为一种近乎全新的职业出现在中国社会中的时间并不长,关于骑手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少,大部分相关研究集中在网络平台与骑手的雇佣关系、时间控制和劳动剥削等方面,较少关注职业稳定性对他们职业发展前景和生活预期的影响。同时,考虑到骑手与新一代青年农民工、新业态青年劳动者之间存在较多相似之处,梳理新一代青年农民工、新业态青年劳动者等群体的生活预期和职业稳定性研究,亦对了解骑手的职业稳定性及其影响有所帮助。故而,对既有研究的梳理围绕骑手职业群体、职业稳定性、生活预期三个主要内容展开。

(一) 骑手职业群体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关于骑手职业群体的学术研究较少,且多数研究基于个案访谈分析,覆盖全国的调查较为少见。朱迪等使用覆盖全国外卖骑手调查分

① 参见美团研究院:《2018年外卖骑手就业报告》, <https://peisong.meituan.com/about>, 2022年2月2日。

② 参见美团研究院:《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0/09-03/9281158.shtml>, 2022年2月13日。

③ 参见美团研究院:《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 <https://www.doc88.com/p-68161807094468.html>, 2022年2月16日。

④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职业——网约配送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 http://www.gov.cn/xinwen/2020-08/26/content_5537493.htm, 2022年3月2日。

析发现，多数外卖骑手对工作持比较满意的态度，在“领导和同事关系”“工作自由程度”“工作环境”“收入及福利待遇”四个方面都有比较高的满意度。^①但看似令人满意的骑手工作，就业质量脆弱性也非常明显。第一，骑手缺乏劳动技能，主要依靠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长时间简单重复的低技能工作增加个人收入，骑手无法通过技能的提升实现劳动回报的增值，其职业发展空间受限。^②第二，骑手与网络平台企业信息资源不对称，面临谈判地位弱势、被平台算法压榨等困境。^③第三，由于骑手行业高度依赖互联网的衍生产业，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可能会不断挤压骑手的职业发展空间，大大增加其职业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④也有学者认为骑手职业群体出现上述困境的真正原因还是在制度层面，长期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大部分在流入地工作的骑手受到制度环境的限制，许多骑手无法被纳入城镇正规就业系统。^⑤尽管上述研究并未直接涉及骑手职业稳定性及其对生活预期的影响，却关注到了影响骑手职业稳定发展的显性和隐性风险，也暗示骑手职业群体虽然看似摆脱了传统农民工群体的困境，但距离真正的体面就业还有较大差距，需要更为深入地探讨他们的职业稳定性。

（二）职业稳定性及生活预期的相关研究

职业稳定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概念，通常无法采用直接测量的方法。不同领域的学者通过构建指标测量体系来测量职业稳定性，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概念。综合以往研究成果不难看到，劳动合同期限^⑥、劳动者就业稳定性自评^⑦、工作转换次数^⑧等是最常用的测量指标。由于采用的测量指标

① 参见朱迪、王卡：《网约配送员的社会认同研究——兼论“新服务工人”的兴起》，《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83~92页。

② 参见崔岩：《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外卖骑手就业脆弱性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93~99页。

③ 参见蓝定香、朱琦、王晋：《平台型灵活就业的劳动关系研究——以外卖骑手为例》，《重庆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第60~69页。

④ 参见邓志强、李若瑜：《新业态从业青年的生计脆弱性研究》，《青年探索》2021年第2期，第66~77页。

⑤ 参见崔岩：《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外卖骑手就业脆弱性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93~99页。

⑥ 参见李丹、王娟：《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稳定性的宏观因素及政策启示》，《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0年第8期，第17~21页；谌新民、袁建海：《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工资效应研究——以东莞市为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94~101页。

⑦ 参见黄乾：《城市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效应》，《人口研究》2009年第3期，第53~62页。

⑧ 参见张艳华、沈琴琴：《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基于4个城市调查基础上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3年第3期，第176~177页。

不尽相同,关于职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择业动机和职业规划、职业培训状况对其职业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①也有研究关注到工作距离、工作年限是影响农民工职业稳定性的主要因素。^②还有研究发现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单位状况(企业规模)、入职门槛也会影响农民工或青年劳动者的职业稳定性。^③然而,也有研究者利用回归模型以全国青年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发现我国青年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与性别、城乡、所处地域经济水平和婚姻状况等个人情况无关。^④

生活预期一般是指个体对未来生活状况的预判或预期。^⑤有学者从经济状况、社会福利保障状况、个体健康情况以及城市流动性四个维度探讨生活预期的作用机制。^⑥生活预期在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在以往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中,生活预期与职业和收入的联系较为密切,一般认为稳定的职业和较高的收入有利于农民工群体获得更好的生活预期。

关于职业稳定性与劳动者生活预期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开展过一些研究。Drobnić等利用芬兰、瑞典和英国等7个欧洲国家的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发现,稳定的工作对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影响,职业发展前景会通过工作满意度间接作用于生活满意度。^⑦Carr等研究发现稳定性较差的工作对欧洲

① 参见何筠、张嘉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及代际差异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218~227页。

② 参见于学文、杨欣:《农民工职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沈阳市的抽样调查》,《农业经济》2017年第12期,第120~121页。

③ 参见郭庆:《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56~66页;韩雪、张广胜:《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稳定性研究》,《人口学刊》2014年第6期,第72~74页。

④ 参见田亦君:《我国青年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20年第4期,第96~102页。

⑤ 参见 Lei Hu, Shengnan Liu and Zhiqiang Yan et al., Expectations for the Future Life of Floating People in Mega-Cities: A Study of In-Migrants in Beijing, China. *Psychology*, Vol. 11 (9), 2020, pp. 1315 - 1339;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125~136页。

⑥ 参见 Michael Wallace and Qiong Wu, Immigr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n U. S. Metropolitan Areas,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56 (4), 2019, pp. 443 - 457.

⑦ 参见 Sonja Drobnić, Barbara Beham and Patrick Präg, Good Job, Good Lif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Europ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99 (2), 2010, pp. 205 - 225.

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作用。^①以澳大利亚劳动者为调查对象的研究发现，从事临时性工作或劳务派遣等非长期性工作的雇员的工作满意度明显低于永久雇员，^②这可能是因为临时性工作加剧了劳动者工作的不稳定性，从而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满意度产生了负面影响，^③即自我感知到的职业不稳定性影响了个体生活预期。Origo 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只要个体工作稳定感低，自我感知到有失业风险，不论是临时雇员还是永久雇员，其生活满意度均较低，临时雇员和永久雇员的生活满意度在统计意义上无显著差异。^④

国内关于职业稳定性对生活预期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多数研究集中关注职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对农民工或青年劳动者生活预期的影响。有研究指出就业状态、工作合同性质、工作时间、保险水平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⑤林晔等曾以泉州市农民工群体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工作稳定性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⑥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农民工都是短期工，他们已经习惯了找工作—辞职—再找工作这一循环方式，在他们眼中工作都是暂时的，失业也是暂时的，正式稳定的工作并不能增加他们的生活幸福感或者提升他们的生活预期。^⑦

已有研究虽然对就业稳定性及其与生活预期的关系进行过一些探讨，但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一是，大部分既有研究对象仅涉及某一区域或者聚焦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分析全国范围的新职业群体（骑手）的职业稳定性及其影响的研究较少；二是，由于样本、研究方法、研究时间等方面

① 参见 Ewan Carr and Heejung Chung, *Employment Insecur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Labour Market Policies across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Vol. 24 (2), 2014, pp. 383 - 399。

② 参见 Hielke Buddelmeyer, Duncan Mcvicar, and Mark Wooden, *Non-Standard "Contingent" Employ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A Panel Data Analysis*,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Wiley Blackwell, Vol. 54 (2), 2015, pp. 256 - 275。

③ 参见 Chris Dawson, Michail Veliziotis and Benjamin Hopkins, *Temporary Employment, Job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Vol. 38 (1), 2014, pp. 69 - 98。

④ 参见 Federica Origo and Laura Pagani, *Flexicurity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Europe: The Importance of Perceived and Actual Job Stability for Well-Being at Work*, *Labour Economics*, Vol. 16 (5), 2009, pp. 547 - 555。

⑤ 参见盛光华、张天舒：《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城市问题》2015年第12期，第89~96页。

⑥ 参见林晔、周毕芬：《就业质量对农民工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泉州的调查数据》，《武夷学院学报》2021年第8期，第43~48页。

⑦ 参见林婷婷、胡平、杜婧等：《我国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现状调查——工作一定能带来幸福吗？》，《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5年第1期，第68~76页。

的不同,职业稳定性与生活预期的关系尚未有定论,需要有更多的研究加以佐证;三是,关于骑手的研究主要涉及劳动保障、^①择业动机、^②社会认同(包括职业认同和城市认同)、^③就业质量^④和社会流动,^⑤缺少对骑手内部差异的区分,将骑手分为专职和兼职两个不同类别有助于更加深入剖析和理解这一新型职业群体。本文重点比较的是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两个职业群体大多属于新一代的农民工青年,其就业的稳定性整体不高,但就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而言,兼职骑手做出兼职的选择,其职业不稳定的意涵更加明显。因此,本文首先分析职业稳定性对骑手美好生活预期的影响,再分析他们在职业发展上影响机制的差异,包括职业前景满意度和职业前景信心。

三、资料来源和变量测量

(一) 资料来源

本文的研究资料分为数据资料和访谈资料。数据资料来源于全国新职业青年调查,该调查由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组织实施。调查对象为18~45岁的新职业青年,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本研究选用其中以外卖骑手为主要职业的样本,有效样本为6196个,其中男性占90.8%,女性占9.2%;被调查者平均年龄为29.92岁。在展开全国范围问卷调查的同时,课题组在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针对骑手进行了个案访谈和焦点组访谈,个案访谈使用半结构式访谈提纲,共计获得236份骑手的个案访谈资料。在访谈过程中,对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有所区分,涉及他们对职业发展和生活预期的看法,这些访谈资料作为本文的研究材料,为数据分析提供更好的经验支撑。

(二) 研究设计和变量描述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性研究是使用访谈资

① 参见王苹:《零工经济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研究——以外卖骑手为例》,《法制博览》2021年第11期,第164~166页。

② 参见郑祁、张书琬、杨伟国:《零工经济中个体就业动机探析——以北京市外卖骑手为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53~66页。

③ 参见朱迪、王卡:《网约配送员的社会认同研究——兼论“新服务工人”的兴起》,《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83~92页。

④ 参见崔岩:《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外卖骑手就业脆弱性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93~99页。

⑤ 参见高文珺:《新就业形态下外卖骑手社会流动特点和影响因素》,《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100~108页。

料分析判断骑手职业群体的就业、生活、保障等内容，并从中提炼出能够与定量研究相互支持的研究证据。在定量研究中，使用统计模型分析调查数据，加以佐证。本文使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一般线性回归和定序逻辑回归模型。一般线性回归模型作为多个学科常用的研究方法在此不做赘述。与一般线性回归模型不同，定序逻辑回归模型是为了分析不太容易用定距测量却又高于定类测量的变量，也就是为定序变量所设定的统计分析模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中被广泛使用。其分析理念是在满足比例优势假定（proportional odds assumption）的基础上，以 Logit 函数为连接函数，将类似于优、良、中、差转化为基于累进分布的概率分割点，如：

$$\text{优在调查问卷中标记为 1, 其概率转化为 } \log \frac{P_{\text{优}}}{P_{\text{良}} + P_{\text{中}} + P_{\text{差}}}$$

$$\text{良在调查问卷中标记为 2, 其概率转化为 } \log \frac{P_{\text{优}} + P_{\text{良}}}{P_{\text{中}} + P_{\text{差}}}$$

$$\text{中在调查问卷中标记为 3, 其概率转化为 } \log \frac{P_{\text{优}} + P_{\text{良}} + P_{\text{中}}}{P_{\text{差}}}$$

定序逻辑回归通过观测样本的极大似然估计值来估计参数，而不是使用一般线性回归的最小二乘法来估计参数，因而在一般线性回归不能很好估计的定序变量中有广泛的应用，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统计分析模型。

本文所关注的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如下。

1. 因变量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本文将其分解为生活预期和职业发展预期两个层面。在社会学研究中，经济社会地位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当下的生活满意度，^① 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往往是通过与自身情况对比做出的判断，即主观判断自己现在的生活情况比未来更好或更差。在社会调查中，由于一些客观指标难以准确获得，个体感知往往更能够反映真实情况。^② 尽管

① 参见 Cameron Anderson, Michael W. Kraus and Adam D. Galinsky et al., The Local-Ladder Effect: Social Statu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3 (7), 2012, pp. 764 - 771; 袁玥、李树苗、悦中山：《参照群体、社会地位与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基于广州调查的实证分析》，《人口学刊》2021 年第 5 期，第 39 ~ 52 页；刘庆英：《农民工的阶层认同与生活满意度——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 年第 18 期，第 220 ~ 222 页。

② 参见吴丽丽、方录、方雪涵：《农民社会经济地位对其主观幸福感影响研究——基于 CSS2019 数据的分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第 120 ~ 131 页。

个体感知是一个主观性指标，却会受到收入、教育和职业等客观指标的影响，^①而收入、教育、职业等指标也是判断一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关键性指标，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经济社会地位的预判能够体现出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基于此，本文将生活预期操作化定义为对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地位的预判。

职业在社会学研究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是社会结构、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研究的中心概念。特别是在复杂的现代性社会，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大部分都把职业作为界定社会地位的首选标准。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沿袭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传统和习惯。在涂尔干、马克思、韦伯、帕森斯的理论中，职业及其代表的社会分工都是理解社会变革和界定社会功能的关键性概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二是职业在经验研究中更容易操作和实现。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往往是科学研究的难点，职业的概念比其他社会指标的概念更容易界定，职业变量在社会调查等操作化过程中更容易清晰表达和测量。职业发展预期不仅与职业本身，而且与个人和群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和变化趋势紧密相连。因此，本文的职业发展预期指骑手对职业发展的看法，在模型中操作化为“职业前景满意度（自评）”和“职业前景信心（自评）”两个变量，这两个变量在问卷中均有直接涉及，前者为定距变量，后者为定序变量。

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是职业稳定性。事实上，根据以往研究测量职业稳定性所采用的主要指标，即便是专职骑手，职业稳定性也不太高，兼职骑手的职业稳定性更弱。在充分考虑骑手职业特点的基础上，本文将职业稳定性操作化为职业状态、失业评估（自评）、劳动合同三个指标。其中职业状态指骑手是兼职骑手还是专职骑手，为二分变量；失业评估（自评）指骑手自我评估未来6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为定序变量；劳动合同指骑手是否和企业或平台签订了劳动合同，为二分变量。

3. 控制变量

本文使用的控制变量包括骑手的年龄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水平、工作时间（包括工作年限和每天工作时长）、职业认同情况、城市归属感、健康状况。具体指标请参照表1。

① 参见李建新、夏翠翠：《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收敛”还是“发散”——基于CFPS2012年调查数据》，《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5期，第42~50页；胡荣、陈斯诗：《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分析》，《社会》2012年第6期，第135~157页。

表 1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变量值	均值	标准差
年龄组	1 = 18 ~ 20 岁, 2 = 21 ~ 30 岁, 3 = 31 ~ 40 岁, 4 = 41 ~ 45 岁	2.44	0.70
婚姻状况	0 = 已婚, 1 = 未婚	0.46	0.49
受教育程度	1 = 小学及以下, 2 = 初中, 3 = 高中 (中专或职高), 4 = 大专, 5 = 本科及以上	2.97	0.94
月收入水平	1 = 2000 元以下, 2 = 2000 ~ 3999 元, 3 = 4000 ~ 5999 元, 4 = 6000 ~ 7999 元, 5 = 8000 ~ 9999 元, 6 = 1 万元 ~ 1.5 万元 (不包括 1.5 万元), 7 = 1.5 万元 ~ 2 万元 (不包括 2 万元), 8 = 2 万元以上	3.02	1.03
工作年限	赋值 1 ~ 12 分	2.66	2.06
每天工作时长	1 小时及以内至 15 小时依次赋值 1 ~ 15 分	10.00	2.52
职业认同情况	1 = 非常不认同, 2 = 比较不认同, 3 = 比较认同, 4 = 非常认同	3.11	0.69
城市归属感	0 = 无城市归属感, 1 = 有城市归属感	0.58	0.49
健康状况	1 = 非常差, 2 = 比较差, 3 = 不好不坏, 4 = 比较好, 5 = 非常好	3.57	0.99
失业评估 (自评)	1 = 未来 6 个月内完全有可能失业, 2 = 6 个月内有可能失业, 3 = 6 个月内不太可能失业, 4 = 6 个月内完全不可能失业	2.45	1.01
职业状态	0 = 专职骑手, 1 = 兼职骑手	0.09	0.29
劳动合同	0 = 未签订劳动合同, 1 = 签订了劳动合同	0.94	0.29
生活预期	五年后社会经济地位等级 1 ~ 10 级, 分别赋值 1 ~ 10 分	5.94	2.65
职业前景满意度 (自评)	满意度打分 1 ~ 10 分, 分别赋值 1 ~ 10 分	6.47	3.08
职业前景信心 (自评)	1 = 非常没信心, 2 = 不太有信心, 3 = 比较有信心, 4 = 非常有信心	2.95	0.79

四、主要研究发现

本文的研究发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使用描述性数据分析结果和个案访谈资料来比较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之间的差异性；第二个部分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使用一般线性回归和定序逻辑回归进一步探求职业稳定性对生活预期、职业前景满意度（自评）和职业前景信心（自评）的影响。

（一）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的比较

研究发现，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差异较大，本文主要关注骑手的收入、社会保障、工作流动、工作动机、工作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等几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1. 专职骑手的收入高于兼职骑手，所有骑手的社会保障均不完善

数据分析发现，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在收入上存在一定差距，65.76%的专职骑手月收入集中在4000~7999元，66.50%的兼职骑手月收入集中在2000~5999元，专职骑手的收入整体高于兼职骑手。其原因在于骑手收入类似于计件工资，与派送单数挂钩，专职骑手工作时间较长，每天能够持续稳定派送的单数较多，收入整体较高。而平台为了维系稳定的骑手队伍，在单价上对专职骑手也有“照顾”，当然也对他们提出了更为严格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数量的要求。

临时工是每单4块钱，然后长期工是每单5块钱，所以说不一样。长期的话每个月必须要送多少单以上，然后对短期工这种兼职也有要求，不过要求特别低。（访谈资料20210122JZQS1）

兼职和全职在每单的金額上相差一块钱。还有就是（平台）每天对每个站点有全职人数要求，要求必须有多少个骑手在岗，然后送够一定的单数，不然这个站点就会被取消。像是正常公司里面那种绩效，相应的人数完成最低要求的单数才能达到（平台）那个份额吧。（访谈资料20210122JZQS2）

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在收入上的差异可以说是平台有意为之，在社会保障上却没有显著差异，不论是专职骑手还是兼职骑手的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均不容乐观。调研发现，大部分骑手只缴纳了意外伤害险，缴纳五险一金的骑手占比偏低。具体来说，在被调查的骑手中，只有四成的骑手缴纳了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不足30%的骑手缴纳了养老保险，25%左右的骑手没有缴纳任何社会保险。从访谈情况来看，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本应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的保险费用，变成由骑手自己负担，一些骑手对缴纳社保并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无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好像也没什么福利，吃住都是自己（管），车子也是自己的，只有意外险，不过也是自己出钱交的啦，（公司/平台）不可能那么好帮你交的。（访谈资料 20210122ZQS1）

做骑手之后就没有社保了，（公司/平台）只是交了个人意外险。（访谈资料 20210122ZQS2）

不管是兼职还是全职（骑手），就是没有五险方面的福利，只有一个意外伤害险。（访谈资料 20210122JQS3）

当然另外一个潜在的原因是不缴纳保险可以增加当期的收入，从以往农民工都更倾向于选择少交社会保险增加当期收入的意愿来看，不交社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也沿袭了农民工群体的特点。

2. 骑手提供了向上流动的职业机会，专职、兼职骑手差异不大

职业是判断个人社会地位的关键性指标，也是衡量社会流动的主要依据。国内外职业分层相关的研究较多，国内学者一般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将职业分层的等级由高到低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企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自雇佣者、农民以及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由于骑手以互联网为媒介，往返于商家和顾客之间，提供配送服务，故将骑手归为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①从劳动的自主权、劳动报酬等方面来看，骑手等新型职业群体在职业分层中的排序要高于传统的工厂工人和自由职业的劳动者。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35.93%的专职骑手和24.47%的兼职骑手的上一份工作为工厂工人；17.01%的专职骑手和20.65%的兼职骑手曾是自由职业者。由此，从职业分层的角度看，52.94%的专职骑手和45.12%的兼职骑手在职业阶层上是向上流动的。当问及“和现在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你认为自己五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将在哪个等级？”时，分别有49.6%的专职骑手和48.55%的兼职骑手认为自己五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将有所提升。这也反映出骑手职业地位的提高为他们带来了更高的生活预期，尽管向上流动的幅度相对有限。

3. 入门门槛低、工作时间自由是专职、兼职骑手的主要择业动机

46.37%的专职骑手和44.44%的兼职骑手在做骑手前均有其他全职工作，专职骑手（28.34%）和兼职骑手（27.18%）认为“入门要求比较简单”是他们选择加入骑手行业的第一原因。“能兼顾家务、照顾家人”是专职骑手（24.00%）和兼职骑手（26.32%）选择骑手职业的第二原因。“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和“可以挣外快”分别是专职

^① 参见高文珺：《新就业形态下外卖骑手社会流动特点和影响因素》，《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100~108页。

骑手（23.81%）和兼职骑手（25.10%）选择这份工作的第三原因。可以看出，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选择骑手职业关注的多是一些现实性因素，对未来生活的考虑相对较少，尤其是对自身职业成长与晋升的关注较少。

正是由于骑手对自身职业成长与晋升的关注较少，他们对工作满意度的关注也比较集中在其他方面，比如骑手对与领导及同事的关系、工作的自由度、工作环境、与个人兴趣相符程度和收入及福利待遇的满意度较高，分数均在6.5分以上（满分为10分），也佐证了自由的工作环境、较高的收入是骑手职业的主要吸引力。而评分最低的是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对社会地位的自评得分，分别为6.03分和5.75分，这表明骑手职业并没有办法改变农民工不断下降的社会地位。^①

4. 专职骑手职业认同度高于兼职骑手，后者的城市归属感更弱

职业认同是个人对其职业生涯的认知和体验，^② 数据分析显示，兼职骑手对骑手职业持“认同”态度的占79.8%，专职骑手认同该职业的比例为87.7%，说明专职骑手对该职业的认同度更高。这可能与骑手们最初的工作预期有关，大多数青年选择骑手职业是为了追求自由的工作时间和较高的收入，而专职骑手的工作环境和收入达到了其职业预期，这在访谈中也有所体现。

我对这份工作基本满意，最初来做骑手也是因为工资比较高，压力不太大。（访谈资料20210123ZQS3）

但对兼职骑手而言，由于本身并没有长期从事骑手工作的打算，在职业预期上也没有体现出强烈的意愿，更多的是骑手的职业特点满足了他们的实际需求，比如用工灵活、补贴家用等。

我对这个工作还是挺满意的，最初是为了补贴家用，因为我这个工作时间如果找别的兼职工作的话，怎么说呢？不适合吧。我们那边儿是因为轮岗，不一定是哪个，不会具体到每天，会有休息的时间。所以骑手这个工时间对我要求没那么严，比较适合我。（访谈资料20210123JQS4）

当问及“是否感觉自己不属于这座城市？”时，分别有41.20%的专职骑手和47.35%的兼职骑手同意这一说法。也就是说，超四成的骑手对所在城市没有归属感。这可能与骑手的工作特点以及长期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有

^① 参见田丰：《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1~143页。

^② 参见罗明忠、卢颖霞：《个体特征、职业认同与农民工职业满意度——基于广东省南海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分析》，《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年第2期，第146~152页。

关。有研究发现，享有的福利越多、工作时间越短、加班频率越低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职业社会地位越高，对其城市归属感有显著正向影响，^①这显然与骑手长时间重复性工作、社会保障不完善的实际状况不符，这些情况会削弱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同时，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大部分不在户籍地工作的骑手无法享受与本地劳动者完全一致的福利及待遇，制度性排斥也会进一步弱化骑手的城市归属感。

（二）职业稳定性对骑手美好生活向往的影响

从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的描述性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既存在不同之处，也存在相似之处，那么骑手的不同职业状态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后续研究需要关注的内容。

1. 职业稳定性对骑手生活预期的影响

表2报告了职业稳定性对骑手生活预期影响的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整个模型的 R^2 值为0.214。首先可以看到，受教育程度、年龄、月收入水平、婚姻状况、五年内继续从事该职业、每天工作时长、工作年限、健康状况、职业认同情况等变量影响显著。与职业稳定性相关的三个变量对生活预期的影响均较显著，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骑手的失业评估（自评）、合同签订情况均与其生活预期呈显著正相关。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兼职骑手对未来生活的预期高于专职骑手，这可能是由于骑手职业风险较大、社会保障不完善、工作辛劳等特点导致行业的整体稳定性较差。一些退役的专职骑手均表示不会再考虑从事类似的工作。而兼职骑手本身具有其他正式工作，有着自己的人生规划，只是业余时间做骑手，对自身的生活预期更好。

我应该不会再考虑骑手工作了，因为我跟你说过，就是暂时性的，除非说我这边没什么事情干了，真的是家里面也出问题了，然后可能会选择高工资的一个行业。家里没有什么事情，我是不会选择这个行业的，因为我知道，这对我们是比较危险的，现在我也不需要这种危险的工作了，因为这种工作确实是拿生命去换的，其实说白一点，比较辛苦，其实没有必要去。你知道这份工作就行了，没有必要去干。（访谈资料 20210123ZTY1）

没想过再回去做骑手。因为第一点，骑手在外面天天刮风下雨都要忍着。第二点就是，没有保障，甚至说是交通事故时刻伴随着骑手。还有一点就是，客人投诉，只要有一个投诉，骑手的工资就少两百，所以说是很不人性化，这些东西（骑手）说白了就只是一个跳板。它不可

^① 参见秦昕、张翠莲、马力等：《从农村到城市：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影响模型》，《管理世界》2011年第10期，第48~57页。

能是你长期的（工作）。没人会愿意一辈子天天都出去风吹日晒雨淋，所以说是骑手工作只是一个过渡。（访谈资料 20210123ZTY2）

其次，根据模型结果可以看到，失业评估（自评）每增加一个单位，即失业可能性每降低一个单位，骑手的生活预期增加 0.265 个单位，这意味着骑手认为自己失业可能性越小，对生活预期越好，也证明了职业稳定性的影响。

最后，签订合同的骑手的生活预期好于未签订合同的骑手，这是因为合同作为劳动者自我保障的关键工具，签订过合同的劳动者的权利可以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而未签订合同的劳动者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表 2 职业稳定性对骑手生活预期影响的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生活预期
受教育程度	0.144 *** (0.032)
年龄组（以 18~20 岁为参照）	
21~30 岁	-0.434 ** (0.138)
31~40 岁	-0.411 ** (0.148)
41~45 岁	-0.517 ** (0.185)
月收入水平	0.570 *** (0.067)
婚姻状况	-0.098 + (0.058)
城市归属感	-0.088 (0.063)
一年内继续从事该职业	0.054 (0.075)
五年内继续从事该职业	0.199 * (0.069)

续表

变量	生活预期
每天工作时长	-0.016 ^{***} (0.004)
工作年限	0.032 [*] (0.016)
健康状况	0.519 ^{***} (0.033)
职业认同情况	0.959 ^{***} (0.048)
职业稳定性	
兼职骑手	0.339 [*] (0.104)
失业评估(自评)	0.265 ^{***} (0.033)
签订了劳动合同	0.377 ^{**} (0.132)
常数项	-4.608 ^{***} (0.566)
R ²	0.214
N	6196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代表 $p < 0.10$ ，*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01$ 。下文表3与此相同。

2. 职业稳定性对骑手职业发展预期的影响

表3模型1所列的数据是以“职业前景满意度(自评)”为因变量的一般线性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水平、年龄(41~45岁)、每天工作时长、工作年限、健康状况、一年内继续从事该职业、五年内继续从事该职业、职业认同情况、失业评估(自评)、签订了劳动合同等变量对骑手的职业发展预期具有显著影响，而城市归属感对其职业发展预期无显著影响。

骑手这个行业没有上升空间。像站长，说白了就是跑的时间长了，和上面的人熟了……就是这样子的。不过有从骑手做上来的站长，

(也)有不是骑手的,骑手做上来的少,大多都是商家指派的。所以(骑手职业)就没什么上升空间。(访谈资料 20210123ZTY3)

对,大家都干不久,一般我看专门跑大城市那种干得时间久点,干两三年就很多了,但是你说小城市,很多时候大家都是抱着“我现在没有事,我找个事情干”的新想法,这个东西来钱快,也不需要什么经验,我是本地人,如果是在本地没有工作,又对路熟,就可以了,也好干。如果说我去大城市,我对路不熟,还是很难操作的,所以很多人大部分都是找个事情干,而不是说长久干。因为这个工作比较危险。像那会下雨天,路滑,虽然说下雨看我们这样穿着雨衣,但是雨往脸上打,我摔过好几次,一下不注意刹车没刹住,撞到别人车上你还要赔他钱,还是挺危险的。(访谈资料 20210123ZTY4)

失业评估(自评)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骑手职业前景满意度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具体来说,骑手的失业风险自评越低,其职业前景满意度越高;签订劳动合同的骑手比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骑手职业前景满意度更高,表明职业稳定性是提高劳动者职业前景满意度的重要条件。总的来看,职业稳定性对骑手职业前景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在调研过程中,也有骑手表示如果能够稳定地在该行业长时间地工作,骑手的职业发展是可以向上预期的。

我觉得骑手职业还是有上升空间的,骑手的流动性很大,(但)如果你真的能在一个站点做2年到3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觉得他总得把你至少提拔成副站长,或者是班长,然后再往上或者是怎么样,这算是一个可能的晋升之路。(访谈资料 20210123JTY1)

表3模型2是以“职业前景信心(自评)”为因变量的定序逻辑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在控制了受教育程度、年龄、月收入水平、婚姻状况、每天工作时长、工作年限、健康状况、职业认同情况、城市归属感等变量的基础上,在职业稳定性变量的三个维度中,做兼职骑手和签订了劳动合同对骑手的职业前景信心无显著影响。其原因在于即便是专职骑手和签订了劳动合同的骑手,他们对职业前景的信心也比较低。失业评估(自评)对骑手的职业前景信心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失业风险可能性每降低1个单位,骑手的职业前景信心提高的可能性增加38%。

表3 职业稳定性对骑手职业发展预期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一般线性回归	模型2:定序逻辑回归
	职业前景满意度(自评)	职业前景信心(自评)
受教育程度	0.161*** (0.034)	-0.017 (0.029)

续表

变量	模型 1:一般线性回归	模型 2:定序逻辑回归
	职业前景满意度(自评)	职业前景信心(自评)
年龄组 (以 18~20 岁为参照)		
21~30 岁	-0.106 (0.146)	-0.016 (0.121)
31~40 岁	-0.218 (0.157)	0.011 (0.131)
41~45 岁	-0.419** (0.196)	-0.061 (0.164)
月收入水平	0.260*** (0.069)	0.116* (0.058)
婚姻状况	0.029 (0.061)	0.131** (0.051)
每天工作时长	-0.021*** (0.005)	0.000 (0.004)
工作年限	0.086*** (0.016)	0.033* (0.014)
健康状况	0.411*** (0.035)	0.361*** (0.030)
一年内继续从事该职业	0.387*** (0.079)	0.167* (0.065)
五年内继续从事该职业	0.499*** (0.073)	0.590*** (0.061)
职业认同情况	1.586*** (0.051)	2.075*** (0.050)
城市归属感	0.055 (0.066)	-0.279*** (0.055)
职业稳定性		
兼职骑手	-0.052 (0.110)	-0.023 (0.091)

续表

变量	模型 1:一般线性回归	模型 2:定序逻辑回归
	职业前景满意度(自评)	职业前景信心(自评)
失业评估(自评)	0.550*** (0.035)	0.325*** (0.030)
签订了劳动合同	0.680*** (0.139)	0.107 (0.116)
常数项	-5.154*** (0.597)	
R ²	0.350	0.254
N	6196	

五、讨论

在现代社会中,职业不仅是决定个人经济社会地位的重要条件,也是决定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影响因素。骑手作为新职业群体,其产生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的时代特征,却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骑手职业群体在就业稳定、工作环境、职业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比较大的争议,这些争议早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关注到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之间差异的相对较少,由于缺少相关的调查数据,有关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对生活预期和职业发展的定量研究更是比较少见。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重点探讨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之间的差异性,进而分析职业稳定性对骑手美好生活向往的影响。

综合之前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到,骑手职业群体在中国社会大规模出现具有特定的时代特点。一方面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地区,他们不再满足于在流水线上像机器人一样终日劳作,入门门槛低、工作时间自由、收入较高的骑手职业对他们而言更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是不少骑手之前都有在工厂务工的职业经历,他们感受到了骑手职业的“高收入”和“自由度”,忽略了职业稳定性、工作环境、职业保护和社会保障上的不足。尤其是职业稳定性方面,在骑手群体整体职业稳定性不强、职业流动性较大的情况下,还出现了更为不稳定的兼职骑手。众所周知,职业稳定性不足带来的隐患较多,会大大降低相应职业群体的生活预期和职业发展预期,但在调研中发现兼职骑手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要高于专职骑手。其原因在于,兼职骑手本身并未将职业发展寄托于目前所从事的工作,而是将其当作人生发展的“跳

板”，从而形成了一个看似悖论却又合理的现象。当然，这种悖论也意味着兼职骑手的职业发展目标与当下所从事的工作并不一致，他们之所以存在，也是受制于自身的经济社会条件。

研究还发现，兼职骑手和专职骑手的职业稳定性带来的差异，除收入外，其他方面的差距并不明显，这背后的影响机制值得研究者们深入思考。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催生了以骑手为代表的新职业群体，但整个社会制度对新职业群体的保护并不充分，且存在明显的行业和产业依附性。新职业群体本身的发展前景并不能真正突破传统社会制度的瓶颈，反而被框定在外卖配送的职业范畴内，导致专职骑手寻找更好职业发展机会的动力和愿景都不足。兼职骑手只是将这一段职业经历当作人生的一个过渡，他们能够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探寻未知的人生历程。在职业前景信心上，专职骑手和兼职骑手之间的差异不显著，根本原因还是他们对职业发展的前景并不看好，只有不到5%的专职骑手和6%的兼职骑手看好骑手的职业前景，在较低水平的职业前景下，他们之间自然也就很难再出现显著的差异。从骑手的职业前景满意度来看，合同保障和失业风险判断影响显著，这又回到了传统意义上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议题的框架之下，呈现与之类似的特点。这个发现背后的原因和形成机制极为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整体对劳动者的漠视依然存在。骑手作为新职业群体不过是互联网产业的螺丝钉、资本逐利的工具，从流水线的机械劳动变成了算法困境下的数字劳动，这与他们在制造业里所处的境遇近乎一致。若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劳动者的立场和定位，骑手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终将难以实现。

互联网新业态对传统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创造了大量的新型就业机会，尽管类似骑手的职业稳定性依然堪忧，但这些职业却为部分劳动者提供了获得比传统制造业更高收入的机会和更自由的工作模式。但骑手最大的问题依然是职业前景和职业保障，只有在骑手职业不被当作资本的工具，也不再被青年劳动者视为职业发展过渡期的跳板时，才能构建出清晰、明朗的发展空间，使骑手对美好生活有所向往。

因调查样本和数据的限制，本研究浅析了职业稳定性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影响，对其背后更为深刻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及影响机制的分析并未全面展开，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有进一步的拓展。

（责任编辑：温莹莹）